

甘肃文史资料选粹

第十五十一辑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编
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 51 辑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
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马 强
封面设计:柳中飞

上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 51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
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陇西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4 字数 28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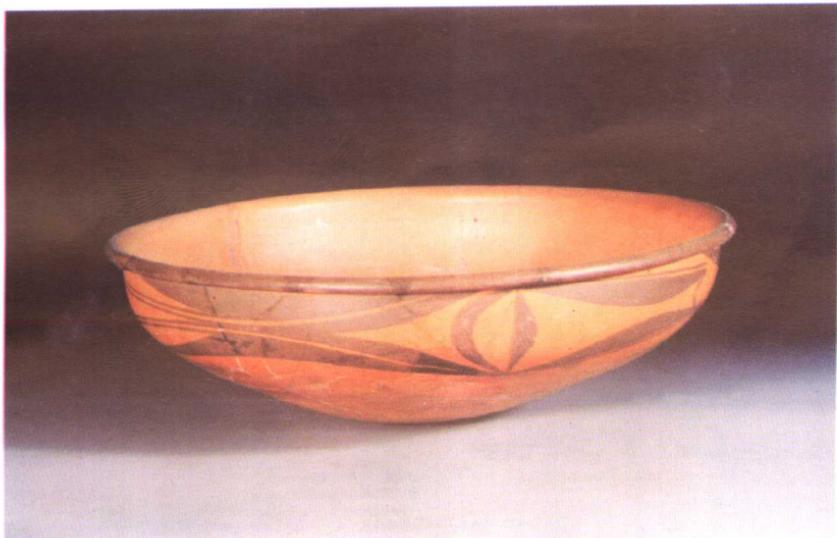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,000

ISBN 7—226—02185—4/K·359 定价:25.00 元

①

仰韶文化 鱼纹形彩陶圜底大盆
秦安大地湾出土 (摄影: 赵广田)



②

1979年8月,居延北部地区的考古调查
(摄影: 岳邦湖)



史不當子業，私牛亦相顧

廿石旨謹也

卷之三

序由左而右，图④⑤为由右而左。

達武三率吉月癸丑朔廿末都鄉
幹林魚五千頭到貨得數員

青天官印言之杜郎明渠附書本年正月的前民窓恩賜
甲子頭批乙未尾額活出時行錢世萬淳些第公借上一百

爲自責，不徇私以所得，或

卷之三
七言律詩
九月三十日同子雲游西山見白雲深處有

③
—
⑤

卷之三

自古以來，人間的風氣，指的就是執事。這個人，就是一個大奸大惡的大壞蛋。

濟世不遺者法華經。如律令

孫室

本來不外乎是爲了自己，爲了家人，爲了朋友，爲了社會，爲了國家。這就是所謂的「利己主義」。

卷之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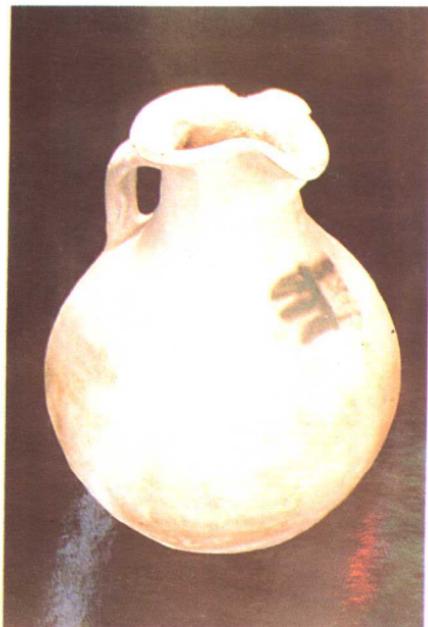
大三軍士二月
吳君所著



⑥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“铜奔马” (摄影:赵广田)



⑦嘉峪关新城魏晋墓“信使”(古代驿传)画像砖
(摄影:赵广田)



⑧ 精绝王国贵族墓出土的东汉龙纹陶罐，其上书「王字」



⑨ 尼雅出土的东汉龙纹铜镜



⑩ 古楼兰的佛塔及三间房屋

(摄影：王炳华)

(11)

甘肃安西西部的汉代长城

(摄影：岳邦湖)

(12)

马圈湾附近的汉长城



(13)

悬泉遗址鸟瞰

(摄影：戴春阳)



(1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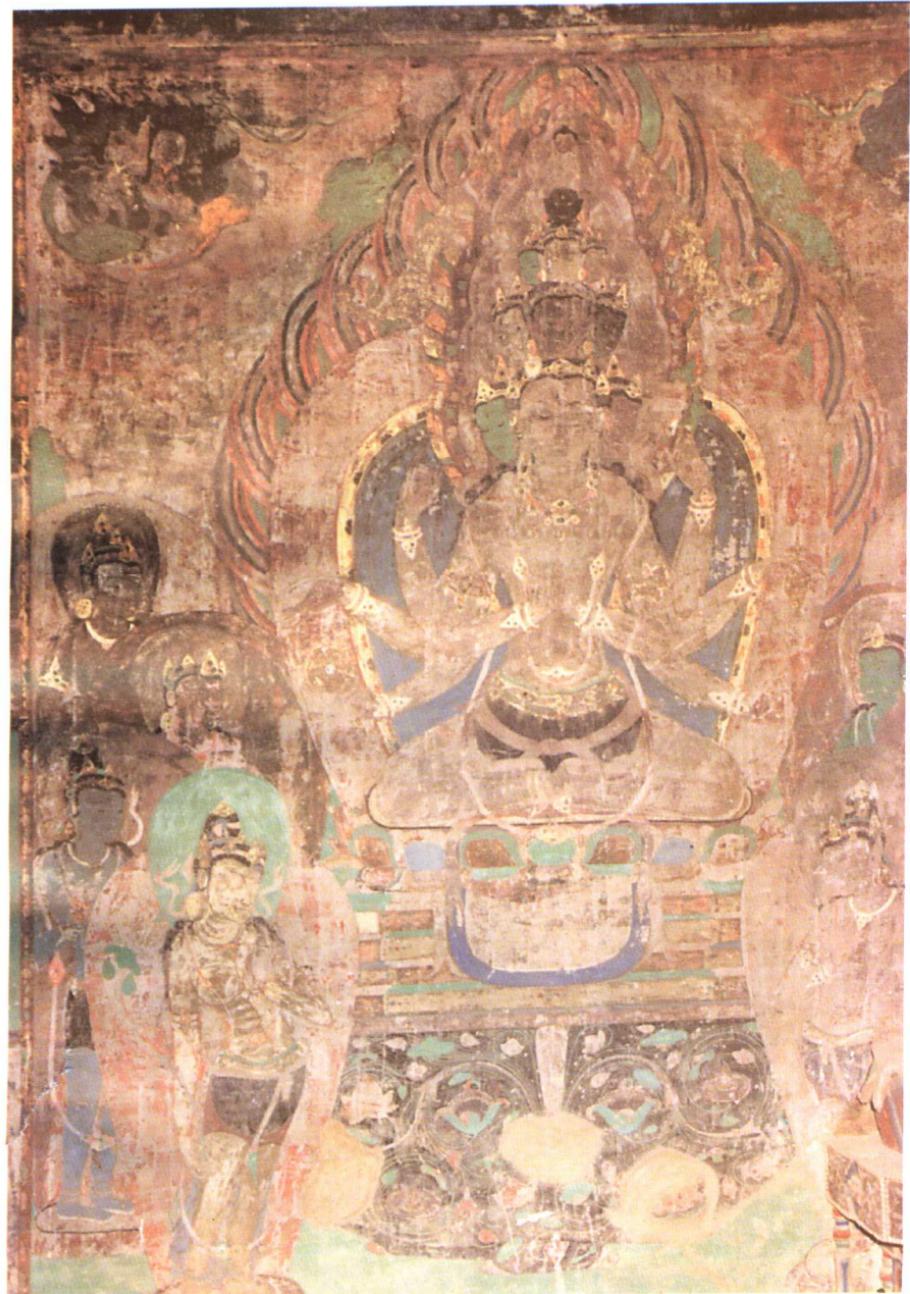
张掖大佛寺发现的明代《北藏》



(14) 武威天梯山石窟《北凉菩萨》壁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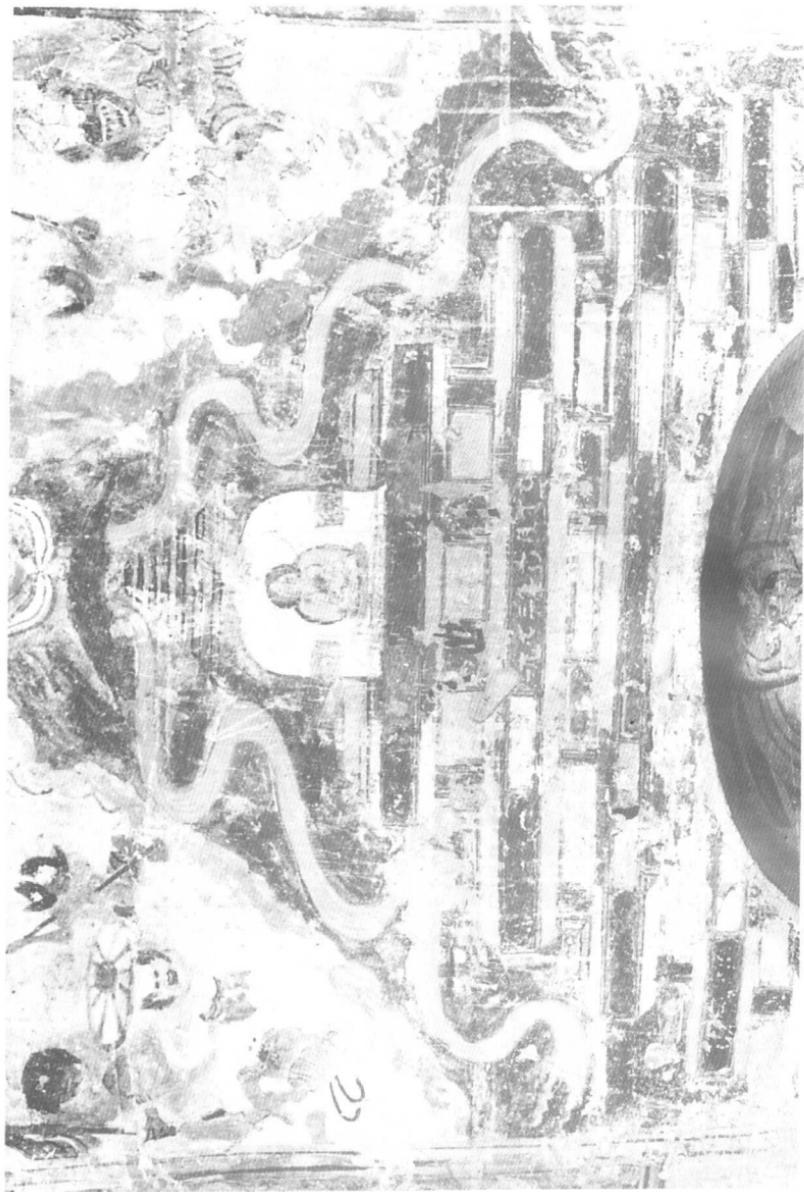
摄影：盛葵海
冯仲年





⑯ 安西东千佛洞第二窟中的观音经变

⑯ 五个庙第一窟中的八塔经变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
第八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

主任:李天昌

副主任:孙一峰

马力(兼)

委员: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生瑞 王振英 关掌珠 朱舜奇

李并成 李最雄 李德奇 汪受宽

张正杰 夏荣生 贾福海 强宗恕

韩效文 潘寅生

主编:李天昌

副主编:何生祖

编 辑:何生祖

目 录

丝路考古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居延考古的回顾 | 初世宾 (1) |
| 大地湾遗址发掘二三事 | 张朋川 (21) |
| 大漠雄风 丝路瑰宝 | 戴春阳 (30) |
| 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发掘记 | 张朋川 (42) |
| 甘肃境内历代长城考察记 | 岳邦湖 (50) |
| 雷台汉墓考古记 | 魏怀珩 (59) |
| 敦煌石窟考古研究中的一些新成就 | 李最雄 殷光明 (70) |
| 敦煌莫高窟北区探秘 | 彭金章 (81) |
|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亲历记 | 荣恩奇 (94) |
| 明英宗颁赐张掖大佛寺藏经发现记 | 张志纯(102) |
| 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搬迁与重大发现 | 张学荣 何静珍(110) |
| 东汉新建玉门关考 | 李正宇(124) |
| 西域考古写春秋 | 王炳华(144) |
| 甘肃永靖发现西晋始创炳灵寺石窟 | 冯国瑞(195) |

政协春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文史资料要为爱国统一战线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| 高旭华(208) |
| 难忘的岁月 | 袁第锐(213) |
| 参加两次纪念活动的回忆 | 杨拯美(218) |

陇上名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爱国人士裴建准先生 | 张尚瀛(222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
缅怀张思温先生 王克江(231)

民族人物

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职尽责 (裕固族)杨进智(237)
正果

——记甘肃省政协常委赛仓 (藏族)尕藏才旦(254)
我从磨难中奋起 (裕固族)钟进文(264)

抗灾减灾

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洪灾害 文丕烈 张维华(271)
桦林乡天局村赈灾纪实 张建国(275)
干群鼓壮志 旱塬写辉煌 周汉漪 张荣德(279)

历史回声

赴朝参战最后一仗 秦效斌(287)
终生难忘的 1949 年 金济梅(297)
邓宝珊将军在敦煌的片断回忆 张仲(305)
榆中县烟草业今昔谈 金耀东 沈克勤(307)

史海钩沉

阎毓善的早期经济政治思想研究 伏阳(313)
西北边塞文学思潮与阎毓善 杨忠(323)
《龙沙鳞爪》选 阎毓善(340)

宗教源流

甘肃道教今昔 程时雨(356)

居延考古的回顾

初世宾

本世纪初叶，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及现代科技的传入，在我国文化学术领域，相继有几批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出土，轰动全世界，即北京猿人、殷墟甲骨、居延汉简和敦煌藏经。被誉为是二十世纪古代东方的四大发现。这几批“国之瑰宝”的问世意义重大，对它们的学术研究，始终是国际上举世瞩目的“显学”。对本世纪中国的史学和文化学术发展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促进。

我在甘肃省博物馆工作的四十年中，有一段时期很幸运地参与了居延汉简的研究和再次考古发掘活动。沉湎其中，时日不短，然而所成甚微。现应约回忆、思考一些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值世纪之交，供后来者参考，亦聊以自慰。

“居延”，作地名始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^①，具体指甘肃、内蒙交界之额济纳河下游的嘎顺诺尔、索果诺尔一带。其地汉时为“居延泽”，水草丰腴宜农牧，建置有“居延都尉”、“居延县”，属张掖郡。汉以前称“弱水流沙”。但唐代颜师古注释《汉书》，说“居延”是匈奴人的一支，因被汉武帝俘获安置于此，遂得名。汉代居延都尉的管辖范围，占据额济纳河流域的大半。这里东遮巴丹吉林沙漠，西依北山山脉为屏障，中为河谷绿洲，南北绵亘四百里。由于历史、气候变迁，现在是沙砾遍野、人烟稀少、环境恶劣，但在古代却是中国西部的南北交通枢纽和门户。尤其居延海附近，远控大漠，近卫河西，左右襟带河套、天山，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。

据史书记载,自西汉武帝开始,为抵御抗击匈奴不断南侵,一代名将如霍去病、李陵等曾亲率大军战斗于此,或驻守待敌,或挥师出击^②。后又大规模修筑边塞城燧,移民屯田戍守,长期相持近两个世纪之久,方克竟全功。汉代在居延的屯戍,对于中国西部疆土和丝绸之路的开拓、保卫有重要作用,也是世界军事防御史上罕见的创举、范例。而汉代以后,这里活动减弱,人迹罕至,绝少变动破坏,岁月留下大量遗迹遗物,如城堡、烽火台、屋舍、田渠的废墟,如今犹原样地暴露在荒原大漠之中,星罗棋布,触目皆是。这对考古探险来说,无疑是最理想的“宝地”。

居延地下埋有宝藏,史书早有披露。唐代牛僧孺《玄怪录》记述,北周时蠕蠕部主勃都骨抵率部众屯居延,每夜地中有喧嚣哭泣,发卒掘败屋残垣,得粮秣、衣囊、兵刃、木简,云乃汉将军李陵部属,与匈奴单于激战兵败处。又黑城遗址(哈喇浩特),蒙族民间流传,成吉思汗西征围攻此城池,城内弹尽粮绝,守将黑将军将无数珍宝投沉城内一古井,然后壮烈牺牲。

关于居延考古,先要提及最初西方人在我国西北的所谓“探险”,特别是英国的斯坦因。他在窃去敦煌千佛洞大批文书、绘画之后,于1906—1915年又连续在新疆、甘肃盗挖了不少汉晋时期遗址,获千余枚文字木简^③。这是近代中国竹木简牍文书的首次出土。其中包含在敦煌汉代玉门关一带烽燧上出土的700多枚,全数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。由此而更加诱发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大肆盗窃文物之风。我国学者王国维、罗振玉、张凤等,及时地研究了这批珍贵史料,^④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简牍研究之先河。其后,20年代末,德国出资欲对中国内蒙、新疆进行全面的综合调查,经中国学界力争,合组了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,由瑞典斯文·赫定、中国徐旭生负责,从北京、包头进入居延^⑤。1927~1928年,中国学者黄文弼等由北部沿河向南至甘肃金塔、鼎新,首先发现居延诸遗址。1930~1931年,团员瑞典人贝格曼接着对200余城障烽

燧等遗址进行逐一调查、编号,对其中的 29 个地点进行试掘和采集,一举掘获木简 14000 余枚,总称之为“居延汉简”^⑦,另有大量其它文物。按协议,实物由贝氏携回瑞典整理,据闻 1955 年中、瑞建交时,瑞典政府将其交返中国历史博物馆。简牍运回北平,由北大、中研院的马衡、刘复、傅振伦、贺昌群、劳干、陈槃、余逊诸人整理考释。后数年即将完成出版,适逢“七七事变”,简牍随人员南迁,辗转天津、上海、香港等地,连年战火,书版焚毁,简牍则转去台湾。50 年代海峡局势紧张,又一度去美国保存,现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。

居延汉简之重要,首先在于简是纸张、印刷发明之前的书籍文档。我国文字、文化的记录、传播载体,自殷商到魏晋共 2000 余年,主要靠在竹木制成的简册上写作,可称为“简牍时代”。而其它甲骨、钟鼎、碑碣、丝帛上的书刻文字形式,均非主流。竹木简册易朽难存,历史上虽有发现,^⑧但早已湮没不存,又绝无传世书,连学者也很难想象出当时的书籍文档是什么样子!简牍出土后,人们才明白所谓“笔则笔之,削则削之”、“韦编三绝”、“学富五车”、“杀青”和“断章错简”的所指^⑨。其次,居延汉简为汉时政府、民间的行政、管理文书、簿籍原件,乃是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原始档案文献库。其数量之巨,样式种数之多,内容之丰富、新颖、可靠,补证史籍并能解决历史疑难之重大价值,均属罕见,故即刻成为学界关注之焦点。劳干 1944 年于重庆刊印简易释文后,学人趋之若鹜,著述甚众,成就显著,空气十分活跃,形成简牍学研究之第二次浪潮,至 60 年代经久不衰。受其影响,1944 年向达、夏鼐等人赴西北,于敦煌再次发现汉简。^⑩建国前后,日本急起直追,森鹿三等数十位学者成立简牍研读班,专攻居延简,颇具势力。我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的简牍研究也是方兴未艾,但因政治原因而资料、人员分散,甚受影响^⑪。英、美、瑞典等国的研究活动也比较活跃。总之,这一时期的研究已走向世界,力量以中、日为主,发布刊印了大量